

● 经济理论与实践

西部地区制度供给的“稀缺性”研究^{*}

范 如 国

(武汉大学 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范如国(1965-), 男, 湖北潜江人, 武汉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 工学博士, 主要从事经济学和经济管理系统的复杂性研究。

[摘 要] 制度是经济增长中的内生变量。西部地区存在制度供给“稀缺性”现象, 其原因在于西部内敛的、超稳定结构的文化及环境特征, 以及政府的制度供给力度不足。解决制度“稀缺性”问题有赖于政府力量的加强和西部地区学习能力的提高。制度变迁离不开社会发展质量的作用。当前西部地区制度创新的方式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 诱致性变迁为辅, 但最终必须逐步转变为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来确立西部制度供给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 西部地区; 制度供给; 稀缺性; 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99(2002)03-0305-07

一、制度的价值与制度供给的“稀缺性”

(一) 制度是经济增长中的“内生变量”

所谓制度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种契约形式或契约关系”, 是为决定人们的相关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行为规则, 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 它限定和确定了人们的选择集合。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制度因素的作用, 离不开有效的制度供给, 经济发展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在制度和结构改进中的经济增长。制度经济学认为, 制度也是生产力, 制度的变迁和演进是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制度是经济增长中的“内生变量”。

但是,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忽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常常舍掉制度因素, 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将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经济学家们仅仅考察经济是如何通过要素投入的变化及生产率的变化来实现增长的, 这种情况在 C-D 生产函数及丹尼森经济增长模型中反映得非常清楚。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表明, 由于制度环境的差异, 即使投入相同的生产要素其经济增长的效果也是不同的。西蒙·库兹涅茨(S. Kuznets)在大量统计资料的基础上, 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从数量和结构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趋势作了说明, 发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在 1971 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奖时, 发表的《现代经济增长: 研究结果和意见》演讲中, 给经济增长下了一个比较完全的定义: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可以定义为“不断地扩大地供应它的人民所需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 而生产能力和提高是建筑在先进基础之上, 并且进行先进技术

所需要的制度上意识形态的调整。”^[2](第 203 页)这充分说明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且每一种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经济价值。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也表明,即使在生产要素投入和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也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道格拉斯·C. 诺思在其 1968 年 10 月于《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1600~1850 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中经过分析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善,因此,船运制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为提高。于是诺思指出,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有效的制度安排在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激励体制,将外部利益内部化,保障竞争中的合作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我国经济改革的历程表明,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来讲就是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不断改革、创新的过程,也是经济和社会不断焕发活力和生命力的过程。正是由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变量,因此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人们日益认识到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不断地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在变量纳入经济发展的研究中来,探讨制度的演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历程和经济发展的质量,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派(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成果最为引入瞩目。

(二) 制度变迁与制度供给的“稀缺性”

制度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展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的起源、制度变迁和创新、国家供给制度等等都与经济发展有关。诺思认为,制度不仅构成了人们在社会政治、社会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而且制度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就显得格外重要。它包括正式制度的供给和非正式制度的供给,具体表现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的供给,以及宗教、道德、习俗、社会公理、价值观等的良好形成等。但是,根据新兴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代表人物科思的理论^[3](第 274 页),一定制度结构的产生,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人口及其构成、技术条件、知识背景、价值观念、政治基础等条件下形成的。只有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化时,才会给追求自身目标值最大化的行为主体造成新的获利机会。为了抓住这些机会,他们会产生变更制度,实行新的制度供给的需求。这种需求或者通过自发的制度创新行为来满足,这时便出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或者通过政府强制的推行来满足,这时便出现了强制性制度变迁。当新制度所提供的边际收益等于维持该制度所需支付的边际成本时,制度演化将停止,制度的供需出现均衡。当新的条件出现时,人们又将出现新制度供给的需求。因此,新兴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是导致制度变迁的原因。制度供给具有动态性、变化性和适应性的特点。我们把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的变迁视为制度创新。然而,制度变迁不是可以随时出现的,它取决于人们根据成本效益分析进行权衡的结果,只有在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人们才会去推动,直至制度创新的最终实现,所以制度净效益大于零是新制度供给的必要条件。

但是制度供给从需求的产生到实际的制度供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创新上的“时滞”问题。由于制度创新中存在着“时滞”,这样就造成了现实中制度供给时常不足的情况,出现了制度供给中的“短缺”现象,使得制度也成为一种“稀缺性”的特殊的资源。人类社会之所以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佳境界”,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制度供给的“稀缺性”所产生的各种制约和限制。

此外,由于制度创新的成本较大,个人或合作团体往往力不从心,而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收益却像其他公共品一样具有外部性,即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潜在利益不是制度创新者独占而是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这种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使得制度创新主体常常不愿主动进行制度创新和提供制度供给,由此又会进一步加剧制度供给“短缺”的矛盾。

因此,为了解决制度供给中的“短缺”问题,有时就需要由政府机构来主导制度创新,由政府承担主要的创新成本。政府在实行制度创新中的这种特殊作用,也加大了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调节和管理作用。同时,解决形成制度供给“短缺”现象的瓶颈因素,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以实现制度供给与需求的平衡。

二、西部开发中制度供给的“稀缺性”

西部开发,作为中国21世纪的重要发展战略,其发展离不开技术、资金、资源、人才、市场的支持,但仅仅依靠这些要素,西部能否发展起来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西部似乎缺人、缺钱、缺资源,还缺技术,但另一个方面又似乎什么都不缺。论人才和技术,有西安、成都、重庆、兰州几个人才技术密集区,教育、科技发展水平和人才分布方面,都高于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之外的大部分东部;论资源,西部的各类资源并不逊于东部,有的甚至超过东部,银川、昆明、贵州、乌鲁木齐、伊宁、关中平原和成渝等地区,也是一片片沃土和绿洲;论资金,西部现在仍普遍存在着有钱无处花(找不到好的投资方向或投资效益太差而不愿投资)以及资金外流现象(相当一部分西部资金通过银行存贷差、横向投资和股票交易等多种形式流向东部地区)。如果把上述几个因素作为西部发展的硬环境,它们构成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现在西部开发最缺的就是其软环境:来源于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尤其是制度的创新和制度的供给,它们构成西部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好的制度供给与制度安排能够形成一种好的机制,好的文化。制度创新加上人才、资本、资源和技术就构成了西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应是西部开发一切政策设计的核心和根本。根据新兴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创新的真正出现,有赖于制度的供给,制度需求只是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实际上,西部缺的不是哪一种具体的生产要素,缺的是制度的供给,缺乏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吸引技术和资金的制度环境和制度机制,制度供给在西部地区呈现出“稀缺性”。

西部地区制度供给的短缺既包括正式制度的短缺,也包括非正式制度的短缺。正式制度有诸如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准则、产权制度、人才制度、法律制度、金融与资本制度等;非正式制度有诸如文化传统、竞争意识、人才意识、市场意识、法律意识、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伦理规范等。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着一个“体制落差”。东部地区由于较为优越的区位优势,往往比西部地区更易获得政府制度变迁的制度安排,西部地区由于不具备这些条件而较少获得政府制度变迁的安排,这样就形成了东西部区域的“体制落差”,这种落差表现为:(1)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制度安排的差异性。如股票市场和上市公司大都选择在东部地区;(2)企业制度创新安排上的差异。东部地区在政府企业制度创新安排中始终走在东西部省区的前面;(3)对外开放制度安排的差异性。我国改革开放的地区选择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他们享有特殊的政策和制度优惠;(4)财税制度安排的差异性。国家的财税制度总体上有利于东部地区,使他们在这一财税制度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上述体制上的落差造成了西部正式制度的短缺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此外,一个地区改革和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民俗、习惯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因素与之配合。目前在西部地区整体上存在一种保守和守旧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还不止是个别人,个别单位,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呈现出一种内敛性的、超稳定的结构特征。在这种群体文化氛围中,守旧观念、守成观念、守土观念、平均主义、等级观念、官本位意识、宗法观念、不服从心态、害怕风险等思想和心态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封闭的社会文化意识圈。在这种文化氛围和社会心态中,形不成正常的市场竞争和人才竞争,而无效率的舌头官司、互相干扰扯皮、人际摩擦现象则无休无止。这些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短缺形成了一种合力排斥创新的现象,大大降低了西部地区各种要素的生产效率,直接导致了西部地区的长期落后。如果说东部地区的腾飞是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的话,不如说是更得益于其知识和制度的“先发优势”与“累积效应”。现在西部地区要发展,就必须克服制度供应上的“稀缺性”,形成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上的“后发优势”,为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知识的积累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西部地区的落后不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质量的落后,同时也是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的落后。西部地区不是没有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制度供给,而是缺乏与市场经济、信息社会要求相一致的,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如果我们希望西部地区的经济蓬勃发展起来,“就

不能只盯着物质资本或技术本身,而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创建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经济体制、社会文化环境方面去”,“热心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及其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6],迅速解决制度的“稀缺性”问题。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是西部开发与西部发展的关键。

三、解决西部地区制度“稀缺性”问题的途径及制度供给的主要内容

(一) 政府与西部制度供给

西部开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西部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既离不开有效的经济市场,也离不开有效的政治市场。如果说经济市场是为了解决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有效配置问题,那么政治市场则是为了解决制度这个稀缺要素的供给问题,而作为政治市场的主体——政府在制度变迁和制度供给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从世界各国和地区发展的经验来看,影响一个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环境、社会能力和管理水平。其中政府在营造制度环境、完善社会能力上起着关键的作用。西部大开发作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主要是在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共同主导下来展开实施的,政府在其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加之在西部地区中央政府以及各级政府本来在体制上,就具有强有力的自然垄断地位,而且掌握着巨大的国有资产,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在制度创新上可以降低成本,这就决定各级政府在西部大开发的制度创新及制度供给中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通过政府的力量加大西部各省、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承担制度创新和体制的供给,以政府为主体快速推动西部地区的制度变迁。政府在制度供给中的这种地位,决定了西部地区的制度变迁和制度供给,目前应以强制性制度变迁所导致的制度供给为主,诱致性变迁所导致的制度供给为辅。之所以这样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强有力的自然垄断地位特征为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是由于西部整体上长期落后这一环境性因素的制约所导致的西部社会自组织能力的脆弱,这种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我们不妨把它叫做一个社会发展中的社会质量。所谓社会质量是一个社会自身的各种系统进行自我学习、自我组织、自我运行、自我发展和自我管理的水平和能力,如市场的自组织能力、产业的自组织能力、制度的创新能力等。斯蒂格列茨认为,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要素中“除了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以外,还有一种资本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资本的形成,国力的增长也取决于这种社会和组织资本。”社会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这种社会组织资本的好坏。如果社会质量太差,政府一厢情愿地把制度创新的职能让渡出去,便会出现政府不管而社会又不愿管或管不了的局面,从而产生“制度供给真空”,形成不了高质量的社会组织资本。目前在我国西部由于社会中介组织发育不成熟、市场基础薄弱、人力资源素质整体偏低、市场意识淡漠、竞争意识差等原因造成了社会质量还不是太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诱导性的制度创新,从而实现诱导性制度供给是比较困难的,必须在政府的主导下来实现强有力的制度创新。

(二) 西部地区的学习能力与西部制度供给

以强制性的制度创新为主,诱致性的制度创新为辅并不是政府在西部开发制度供给中发挥作用的真正目的,最终还是要过渡到以诱致性制度创新为主,强制性制度创新为辅的状态。这个状态就是西部规范的市场体制已经建立及发挥正常功能,社会质量比较高的时候。从西方国家发展的情况来看,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市场体系比较健全,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功能发挥得较好,社会组织资本比较高,其经济制度和企业制度的变迁及制度供给采用的就是以诱致性制度创新为主的方式。然而这一转变不是自然实现的,它取决于西部地区各级组织的学习能力。一个组织能否生存和发展主要取决于这个组织的学习能力,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也是如此。按照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知识存量的增长是制度演化的动力,知识存量增长与现行价值观念结构之间的矛盾和协调关系决定了制度演化的各种方式。不同文化的接触之所以往往引起制度演化,便是因为知识存量会由于这种接触而迅速增长,而知识存量

形成和增长的根本途径是学习。强制性制度演化的速度受制于这个社会学习和适应新方法的能力,强制性制度一开始并不是被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的,它要取得成功,很重要的一条原则便是人们对它的学习、理解、认同、接受,转化为一种生产和生活的习惯和规范,并能够在代际间遗传。由于学习能力的增强,知识存量的迅速增长,社会质量的提高,人们在制度变迁的方式上也就由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逐步转变到诱导性制度变迁为主,制度供给变为诱导性制度供给。这时社会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就成为一种良性的、自觉的和主动的行为,而且有能力进行自主制度创新、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我国西部地区要想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从根本上还是要注重学习能力的提高。通过学习,改变西部的“非正式制度”供给,即在市场意识、风险意识、效率意识、人才意识、竞争意识、资源意识等方面得到显著提高,进而促进正式制度的改革。学习的方式则是各种各样,如大力发展教育,引进外部先进的技术、人才、信息、东西部地区干部交流等。因此,加强西部地区的学习力度,把西部的各单位、各部门变成一个学习型的组织,既是西部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的要求,更是西部地区整体发展的要求。此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诱导性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远远低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而制度的功能之一就在于降低各种直接和间接的交易费用。因此,由强制性制度变迁最终转变为诱导性制度变迁,也是制度创新的内在要求,而且这种转变也是一个社会日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 西部开发中制度供给的主要内容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人才、资本、信息及企业家的才能等要素的开发和使用。因此,目前以政府为主导的西部地区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从根本上讲就是为西部开发所必不可少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形成提供制度保障。目前西部地区急需在正式制度供给与非正式制度供给方面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在正式制度的供给方面主要表现为:

(1) 人才制度。人才或者人力资源在西部开发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新古典经济模型中的残差部分,在 Romer 眼中是知识的积累,在 Lucas 看来是人力资本。知识积累的主要方式也是人们通过学习来实现的。人才的学习能力不仅是西部制度创新的要求,而且人才的学习能力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更是西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西部地区应在人才吸引和使用制度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具体来说,就是国家应改变目前的人员管理(包括户口、档案、聘用、社会保障等)制度和分配制度,根据不同的人才情况制定吸引政策,为人才向西部流动创造良好的制度基础。刘易斯认为,“制度促进或者限制经济增长取决于制度对努力的保护、为专业化所提供的机会,以及所允许的活动的自由”的程度。这里所说的制度对努力的保护是指一个赋有效率的制度应该使个人的私人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的收益率,让个人的努力与其报酬真正挂钩。比如在分配制度上,当年英国开发西部时,去西部人的工资是其它地区的 10 倍;美国开发西部时,在西部工作半年就能拿到全年的工资。我国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西部开发时,当时从收入到住房,各种边远地区补贴加在一起与南方一家人 14 平方米的住房相比也都有明显优势。但是目前在我国西部地区,制度在把人们的努力与报酬联系起来的程度还很低,制度在保障人们经济自由方面还较差,还缺乏一种公平竞争、真正体现自己才能的制度环境。所以西部的许多人才都到东部去了,出现了“孔雀东南飞”,希望更换一个制度背景,使自己同样的劳动可以获得较高的极酬。因此,制订“待遇留人”的各项政策是避免本地人才“东南飞”,实现外地人才“西北飞”的重要条件。

但是仅有待遇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创造出“感情留人,事业留人”的制度环境,创建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环境。作为人才,他们希望得到合理使用,希望有施展才能的“舞台”,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给他们创造充分的事业环境,包括技术环境与活动空间。通过改变西部的社会文化环境,营造“以人为本”的制度环境,使他们在良好有序的机制环境下使自身的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配置,真正体现作为人才的价值。同时在西部要加速建立竞争的经营管理能力和职工的劳动力市场,建立企业家的“市场选择机制”,让市场竞争将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和经营管理能力的人才推上管理者的岗位,真正实现人人“各得其所”,人才正常流动的用人目标。

(2)资本市场制度。积极完善和发展市场体系,加快培育和规范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和产权市场,以及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的步伐,通过完善市场运行规则,以行之有效的制度供给,为西部吸纳或融通资本及其它生产要素提供保障。

目前政府应利用其强制性和组织的规模经济优势,通过构建“淘金机制”和“抛砖引玉”机制,为国内及国外的资本向西部流动创造条件。所谓“淘金机制”就是西部要有好的项目,资本去了之后能够赚钱。而“抛砖引玉机制”则是政府先期投入一笔资本,为开发提供生存的基础设施。政府抛出“砖”,引来民间资本这块“玉”。当前我国西部既缺钱,又缺技术,我们在实施西部开发的战略中,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一方面要为各类资本寻找和提供好的项目,另一方面政府还得先期有所投入,在基础设置及其它软、硬环境上有所作为,否则项目再好,人和资本进不去也是枉然。

(3)产权制度和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国家要加大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改革的力度,实行更加灵活,更加适应西部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更为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压缩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形成市场充分竞争的市场主体群和机制。加大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合理建立与西部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法人财产制度,建立起规范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完善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机制。像对“兰炼”和“兰化”合并重组为兰州石化公司一样,通过购并、出售、转让、分拆等方式对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按照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的要求实行战略性改组。

(4)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要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加快西部地区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转换,加大政府服务于市场的功能,加速政府对西部地区金融、保险、电信、流通、财税、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配套改革,打破地区封锁,引导公平竞争,实现资源及信息的充分流动;积极发展和完善市场体系,引导企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逐步从市场活动中退出,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通过政府强有力的制度供给和市场功能的逐步增强,最终实现西部地区社会发展质量的显著提高以及经济的根本转型。那时政府在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方面的作用也就由强制性制度创新转向由市场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政府也就完全可以从市场活动中退出了。

在“非正式制度”的供给方面主要表现为:

(1)加大思想解放的力度,特别是加大干部队伍的思想解放的力度。思想观念的守旧,是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领导干部作为正式制度创新的主要倡导者与正式制度的主要执行者,自身的思想不解放,是不可能承担起历史的使命的,西部的制度创新与西部的整体发展也就是没有希望的。通过建立起人才观点,竞争意识,实现能者上、庸者下,以及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冲破保守思想、守旧观念的思想之门,开启更多的思想之窗、智慧之窗和开拓之窗,从而以更多的方法,更多的路径,去培养和留住更多的人才,获得更多的资金和项目,扫清西部发展中的“观念瓶颈”障碍,焕发出巨大的物质与社会力量。

(2)大力发展教育。思想的解放,从根本上讲还是依赖于教育。教育不发展,思想解放就是一句空话,把西部各部门变成一个学习型组织只能是一个理想。在教育中,教会人们学习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要求相吻合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技能、新理念、新价值观,逐步冲击内敛、超稳定结构的文化结构和社会心态,形成良好的意识形态。因为良好的意识形态能减少强制执行和实施各种制度的费用。

当然,“非正式制度”的改革不能单独实施,它必须与“正式制度”的改革密切结合起来,因为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体制改革、经济发展、观念变革相互之间,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在西部制度供给上,有一点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即制度是难以引进的。即使把东部地区乃至国外的一些制度强制性地照搬进来,这些制度往往会变形,甚至无效。因此,西部地区在进行制度创新时,一定要结合西部地区具体情况,把资本、技术、劳动力、自然资源等有形因素与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无形因素结合起来,综合分析,创造出在西部地区有生命力的,具有西部特色的制度体系。

[参 考 文 献]

- [1] 西蒙·库兹涅茨. 现代经济增长[M].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1.
- [2] 卢现祥.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6.
- [3] 科思.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1.
- [4] 洪名勇. 制度变迁与省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J]. 国民经济管理(人大复印资料), 2001, (9).
- [5] 邹东清. 是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N]. 中国经济时报, 2001-12-11.
- [6] 吴敬琏. 制度重于技术[N]. 中国经济时报, 1999-05-21.
- [7] 张旭昆. 制度演化分析的历史回顾[J]. 经济学动态, 2001, (9).
- [8] P Rome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Quarter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6, 70: 65 ~ 94.
- [9] R E Lucas. On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y, 1988, 94: 1002 ~ 1037.
- [10] W·阿瑟·刘易斯. 经济增长理论[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0.
- [11] 王东京, 等. 用“两个机制”开发西部[N]. 中国经济时报, 2000-11-09.

(责任编辑 邹惠卿)

Research on Scarcity of Western Area Complex Institutional Supply

FAN Ru-guo

(Wuhan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FAN Ru-guo (1965-),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majoring in economics and complexity of economic management system.

Abstract: Institution is an internal Variable on the economic growth. There is a institutional supply scarcity in the west areas. It results from the west's culture and circumstances character that is a internal convergence and over Stable structure, and limit institutional supply from the government. Solving the problem depends on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s role and improving the west study ability, institutional changes connect with the social quality. Forced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first way and 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second one when the west area works for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now, but it must exchange at last. The main contents on the west institutional supply come from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

Key words: western areas; institutional supply; scarcit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